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0-26

2010年6月9日

高崗裡通外國查無實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潔

2010年3月16日,《作家文摘報》轉載了張文木的文章並起名為〈“高崗事件”的國際背景〉。¹該文說,“斯大林將柯瓦廖夫轉給他的關於中共黨內情況的‘密件’親自交給毛澤東。該密件‘出賣’了高崗”(這不是什麼密件,而是柯瓦廖夫寫給斯大林的一封信——本文作者註)。早在三年前,即2007年6月26日同一個《作家文摘報》還轉載了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2006年12月出版的《赫魯曉夫回憶錄》中的一段,並為該段起名為“斯大林為何要‘出賣’高崗”。該《回憶錄》談到“當時擔任蘇聯政府駐華經濟事務全權代表的是一位鐵路專家(此人只是蘇聯駐中長鐵路的代表,即柯瓦廖夫——本文作者註),此人報告說,發現對蘇聯的不良情緒,這種不滿在劉少奇、

¹ 張文木:〈“高崗事件”的國際背景〉,《看世界》2010年3月號上期。

周恩來及該國其他一些領導人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高崗早在毛訪問莫斯科之前也給我們發來了類似的情報……高崗隻字不提毛本人的立場如何，也不提毛對那些明顯表示對我們不滿的人都採取了什麼措施，只列舉了許多事實以證明這種不滿的存在……斯大林希望博得毛對我們的好感，因此拿到我國駐東北代表寄來的附有他與高崗談話紀錄的幾份文件之後，乾脆就把它們轉送給毛了”。2010年5月21日，《作家文摘報》又再次轉載了一篇所謂高崗裡通外國的文章。²《作家文摘報》轉引的這三篇作品的核心內容無非是兩點：一，都是談高崗曾向柯瓦廖夫提供情報，柯瓦廖夫把情報書面報告給了斯大林，而斯大林出賣了高崗，把這個報告交給了毛澤東；二，說高崗曾向斯大林建議，把東北變成蘇聯的第17個加盟共和國。

非常遺憾的是，這兩點或者說兩件事情從根上就搞錯了。因為在歷史上既不存在高崗向柯瓦廖夫提供情報這一件事，也不存在高崗向斯大林建議，把東北變成蘇聯的加盟共和國這另一件事。

先說說第一件事。事實是這樣的，1947~1948年林彪和羅榮桓在前方打仗，高崗在後方主持中共東北局的工作。在此期間蘇聯

² 秦曉凡：〈高崗在莫斯科挑起與劉少奇的公開爭論〉，《黨史博採·記實版》2010年第5期。

這是一篇難得的奇文。因為該文所談到的種種“歷史事件”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中還沒有出現過，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關於劉少奇、高崗1949年訪蘇的詳細材料可以證明這一點。舉個例子，該文章的題目——〈高崗在莫斯科挑起與劉少奇的公開爭論〉就沒有任何事實依據。1949年在莫斯科，高崗和劉少奇之間沒有發生任何爭論。再舉個例子，該文說高崗於1949年7月27日在莫斯科建議，把東北變成蘇聯的第17個加盟共和國。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劉少奇、高崗1949年訪蘇的材料證明，從無此事。怪不得一些看過中央檔案館的材料（指1949年劉少奇、高崗訪蘇的材料——本文作者註）的同志在讀了秦曉凡的文章後，感慨萬分地說：“完全是一派胡言亂語！”

駐中長鐵路的代表柯瓦廖夫由於工作需要曾幾次拜訪在哈爾濱的東北局。時任東北局書記的高崗接見了他。高崗接見柯瓦廖夫時如下人曾經在場：東北公安部部長汪金祥和副部長陳龍、東北鐵道總局局長余光生等。陳雲同志和李富春同志有時也在場。此外，翻譯徐介藩等人也在場（高崗不會說一句俄文，柯瓦廖夫不會說一句中文，必須借助翻譯，翻譯均是中共東北局指派的中國同志——本文作者註）。這些當年在場的人後來都衆口一詞地表示，從沒聽見高崗向柯瓦廖夫提供情報，從沒聽見高崗向柯瓦廖夫談論我中央領導人。此事，有關方面已調查了多次。特別是翻譯同志不光被問了很多遍，而且還寫了書面證明材料。所以說，柯瓦廖夫在給斯大林的信中所談的高崗向他提供情報反映我中央領導人的對蘇態度一事完全是憑空杜撰；所以說，後來由柯瓦廖夫這封信所引起的一系列對高崗的猜疑、聯想、發揮、批判都是不能成立的。滑稽的是赫魯曉夫居然相信柯瓦廖夫瞎編的這個幻想故事。他甚至在《回憶錄》中憤怒譴責斯大林，認為他把高崗提供給柯瓦廖夫的情報轉交給了毛澤東，出賣了高崗。但是，無論是斯大林轉交給毛澤東信件還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轉交信件行為的憤怒聲討，二者均屬無稽之談。因為它們都建立在柯瓦廖夫的謊言的基礎上。

在 1954 年高崗被打倒後，在批判高崗的會議上，有人又提出柯瓦廖夫這封信，並據此說高崗裡通外國。但是這種說法並沒有出現在中共中央文件裡。

說到這裡也許人們要問，柯瓦廖夫當年為何要編造這個謊言呢？原來在 1949 年 12 月毛澤東主席訪蘇期間發生了一個小插曲，這個小插曲促使柯瓦廖夫惡從膽邊生，編造了這個在中蘇兩國甚至在整個世界流傳了 60 年的彌天大謊。

當事人之一師哲回憶說：

同我們一起來來到莫斯科的柯瓦廖夫和費德林也常來看望毛澤東。有一次他們來了，我不在，毛澤東向他們發了頓脾氣，說：“你們把我叫到莫斯科來，什麼事也不辦，我是幹什麼來的？難道我來這裡就是爲了天天吃飯、拉屎、睡覺嗎？！”

我返回時，柯瓦廖夫和費德林剛要離去，我送他們出門，發現柯瓦廖夫臉色不好。他們走後，毛澤東情緒很好，把他罵柯瓦廖夫的事如此這般給我說了一遍，並說他的目的是讓他們去向斯大林反映（我們的不滿）。

這又是中、西方的差異。毛澤東按中國人的想法：對待下級的態度就意味著對其上級的態度；對僕人的態度就意味著對主人的態度。因而下級往往把對某人某事的不滿反映給上級，求得同情；僕人將受的氣稟告主人，求得庇護。但是蘇聯人並非如此，他們的下級在外面受了氣，說明他不會辦事，上級知道了更會對他不滿，甚至斥責、處罰。所以柯瓦廖夫根本就不敢讓斯大林知道他受了毛澤東的訓斥。毛澤東的目的達不到。

但是柯瓦廖夫仍然有氣，他要設法出這口氣。於是他給斯大林寫了一份長篇報告，把他對中國領導人的一知半解，加上有意的歪曲、捏造，說了許多壞話。在一次會談時，斯大林把柯瓦廖夫的報告交給了我們，並說：“柯瓦廖夫是個鐵路上的技術人員，他不懂政治，卻還要往政治裡鑽，他要鑽到政治裡，就像老鼠鑽進了風箱。”斯大林還聲明：“這是柯瓦廖夫自己寫的，不是我們授意的。”柯瓦廖夫的報告交給了我們，但誰也沒看，我只略看了幾行。全是無稽之談。³

以上就是所謂高崗向蘇聯人提供情報的那份報告（信）事件

³ 師哲：《毛澤東的翻譯——師哲眼中的高層人物》，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7、88頁。

的來龍去脈。從師哲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第一，柯瓦廖夫給斯大林的這封信是他在蘇聯自己寫的，而不是高崗讓他寫的，更不是高崗寫好後讓他轉交斯大林的。第二，斯大林不贊成這封信的內容，以致後來不再讓柯瓦廖夫到中國來工作，而改派阿爾希波夫來華。”⁴ 第三，柯瓦廖夫的這封信是他在受了毛澤東的氣之後帶著情緒寫的。信中充滿了怒氣以及一知半解的歪曲和捏造。對於這樣一封信，斯大林的態度是不贊成，毛澤東當時的態度是不加理睬。⁵

但是，汪東興回憶說：

1949年12月28日深夜，毛主席對我說：“等我把國內的事情處理完了，我有話對你講。”

毛主席辦完公，把我叫來，對我說：“最近斯大林同志交給我一份有關中國問題的信。這封信中涉及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問題，我看是有人提供材料，讓別人寫，告洋狀。”

主席問我：“你知道什麼是告洋狀嗎？”我說：“就是向洋人告狀嘛。”

主席點頭同意。⁶

看來毛主席曾經對柯瓦廖夫的誣告信信以為真。可是隨後這段時間，即1949~1953年秋，高崗在中國政界始終處於上昇的狀態。這種形勢又表明毛主席後來還是相信了我有關方面對柯瓦廖夫信件的查無實據的調查結果。不過，無論相信還是不相信，這一切都不重要。因為正像本文前面所說的，柯瓦廖夫信裡所說的事情本身是虛構的，所以在這個虛構故事的基礎上所引發的一切

⁴ 趙家梁：〈對“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一文的幾點意見〉，《百年潮》2002年第3期。

⁵ 師哲：《毛澤東的翻譯——師哲眼中的高層人物》第88頁。

⁶ 汪東興：《汪東興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168頁。

猜疑、評論、聯想、發揮、批判都是無意義的。

對於柯瓦廖夫的這封信，赫魯曉夫欣喜若狂。“退休”在家的赫魯曉夫寫回憶錄時，一如既往地把矛頭對準了他的兩大仇敵：斯大林和毛澤東。柯瓦廖夫多年前杜撰的那個高崗向蘇聯提供情報的幻想故事被赫魯曉夫從歷史的垃圾堆裡撿了出來，當作既打擊斯大林又打擊毛澤東的武器。

在赫魯曉夫的《回憶錄》裡還有一段奇文：

有一次我們幾位在中國的人報告了某一個城市舉行青年聯歡晚會的情況。參加晚會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開始對我們說些含有敵意和挑釁的話：“把你們那個姓高的弄到你們那兒去吧，他是你們的人，不是我們的人。”⁷

應該在赫氏的這個故事上貼一個標籤：MADE IN SOVIET UNION。稍有點常識的人都明白，20世紀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中國青年不可能那樣說話，更何況當時參加對外聯歡會的年輕人都經過政治挑選，他（她）們不可能在對外聯歡會上喝醉酒並且無端地誹謗自己的國家領導人，這實在是天方夜譚。在聯歡會上喝醉了、發酒瘋、胡說八道的是哪國人，大家心裡都明白。

綜上所述，《赫魯曉夫回憶錄》裡談到柯瓦廖夫向斯大林寫信，反映高崗向他提供情報，純屬無中生有的杜撰。先不說當年所有在場的中國人證明無此事，就是稍微能理智思維的人都會想一想，以高崗的身份和經歷，他可能做這種事嗎？！

有一個李先生（LYR）揭發說高崗1953年冬在火車上與捷沃西安會談時曾向他提供情報反映我國中央領導內部情況。1953年蘇聯派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冶金工業部長捷沃西安來華，參加鞍山

⁷〈斯大林為何要“出賣”高崗〉，《作家文摘報》2007年6月26日第16版。

無縫鋼管廠等三大工程竣工投產典禮。經中央研究決定派高崗會見他並陪他去鞍山。高崗與捷沃西安的所有談話均在一間會客兼餐廳的車廂裡舉行。我方在場的有時任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時任國家計委秘書長馬洪、高崗的秘書趙家梁、高崗的衛士長白俊傑。

後來，有關方面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組織曾多次向他們調查，除了李先生（LYR）外的其他所有人始終堅持事實：沒有聽見高崗向捷沃西安提供情報，沒有聽見高崗向捷沃西安談論我國領導人。例如趙家梁回憶說：“在高崗的專用車廂裡，除警衛、隨員和高崗自己的臥室外，還設有一個較大的會客室兼作餐廳，因此他的一切活動都在這節專用車廂裡。當天上午在車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權和李越然的陪同下來到高崗會客室。他們談話時馬洪和我都在場，我沒有看到尤金，也沒有聽到高崗談論有關中共中央的情況。關於這個問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多次有人來找我調查，我當時就如實寫了證詞。”⁸

高崗當年與捷沃西安的談話不像現在兩人在咖啡館見面海闊天空一通神聊。作為國家副主席的高崗每一次接見外國人事先都要由秘書準備好談話內容報請中央批准後才能舉行會談。會談時也不是高崗一人在場，而是中方數人陪同，更何況高崗當時已經開始挨批，他接見外國人時愈加格外謹慎。據趙家梁回憶，高崗當時完全按照由秘書事先準備好並經中央批准的內容談的，沒有半句現場發揮，哪裡會出現高崗在會談時向捷沃西安談我中央內部情況這種奇聞怪事！總之，當有關方面調查時，除了李先生（LYR）之外的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說沒有聽見過李先生（LYR）揭發的那段談話。那麼這位李先生（LYR）的揭發到底從何而來呢？為什麼這位李先生（LYR）聽見了當時在場的其他所有人都

⁸ 趙家梁：〈對“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一文的幾點意見〉，《百年潮》2002年第3期。

沒有聽見的內容呢？高崗的秘書蘇丹曾為此當面質問這位李先生（LYR），據說這位李先生（LYR）面紅耳赤，無言以對。順便說一句，這位李先生（LYR）及其父親曾經長期向蘇軍提供情報，看來他把他們家族的行為方式強加到高崗身上了！

由於所有關於高崗裡通外國的指控都查無實據，所以在後來批判高崗的所有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沒有談到所謂的裡通外國問題。這些文件分別是：

《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1954年2月10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建議一致通過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人民日報》1954年2月18日）；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1955年3月31日通過）；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1956年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但是，1958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突然把高崗和裡通外國聯繫起來。他說：“這裡講一個裡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有許多事實證明了的。”⁹

聽了毛主席的這番話，所有與此有關的人（調查此事的人和被調查的人）都極其愕然。他們心裡清楚，所謂高崗裡通外國，多次調查結果都是查無實據。身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不會不知道調查的結果。既然毛主席不顧調查結果堅持把高崗定為裡通外國，那當初何必要讓他們調查呢？私下裡雖然這樣議論，但是

⁹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21頁。

在當時那種政治氣候下沒有一個人公開站出來說話。

再說說第二件事。高崗去世 37 年後，即 1991 年，俄國漢學家岡察洛夫訪問柯瓦廖夫。已退休多年並在貧困線上苦苦掙扎的前工程師柯瓦廖夫受寵若驚。為了留下一個驚人印象，改變其悲慘的處境，他腦瓜裡的編造故事的閘門又打開了，創作思潮洶湧澎湃，奔騰而出。他說：“有一件事發生在 1949 年 7 月 27 日那次聯共（布）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收回了請蘇聯空軍和潛艇幫助解放臺灣的問題，隨後情緒十分激動的高崗也發了言。他完全贊同劉少奇的發言，繼而表示，他想提出他個人的一項建議。高崗說，他建議宣佈東三省為蘇聯的第 17 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當時蘇聯共有 16 個共和國，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當時也具有加盟共和國地位）。”¹⁰ 可是，當年劉少奇高崗訪蘇時擔任翻譯的師哲回憶說：“柯瓦廖夫根本沒有參加過劉少奇和斯大林的會談——所以他並不知道談判的經過。”師哲還特地談道：高崗“作為中國人，中共政治局委員，從未當眾也絕不會提出將東北變成蘇聯的第 17 個加盟共和國。高崗很不滿意蘇聯搬走東北的機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是劉少奇不同意。高崗連我們的機器被蘇軍搬走都不同意，他怎麼會提出將東北變成蘇聯的第 17 個加盟共和國？”事情已經真相大白，從來沒有參加過斯大林劉少奇高崗會談的柯瓦廖夫編造了那次會談的內容，而參加了那次會談的師哲同志揭露批駁柯瓦廖夫對那次會談的所謂回憶“這是柯瓦廖夫憑自己主觀臆想杜撰出來的”。¹¹

張文木以為師哲的這個觀點無法成立。他指出，1949 年 6 月

¹⁰ 張聿溫：《死亡聯盟——高饒事件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7 年，第 386 頁。

¹¹ 李海文：〈毛澤東劉少奇訪蘇及中蘇兩黨關係中的一些問題〉，《人物》1993 年第 2 期，第 90、92 頁。

27 日斯大林參加的那次中蘇兩黨高級會談（中方代表團三人：劉少奇、高崗、王稼祥；蘇方代表團三人：莫洛托夫、米高揚、馬林科夫——本文作者註），事實上，柯瓦廖夫參加了，師哲反而沒有參加，張文木拿出了“鐵證”：“《斯大林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中關於 1949 年 6 月 27 日這天斯大林接見劉少奇一行人員進入會場的記錄與師哲的記憶正好相反……這是劉少奇一行到達莫斯科後首次受到斯大林接見，因而不可能有記錄錯誤。檔案記錄顯示：柯瓦廖夫於當天晚 23 點進入，24 點離開斯大林辦公室，進出的時間與劉少奇、高崗、王稼祥完全一致。這說明柯瓦廖夫不僅參加了會議，而且是隨中方人員同進出，因此可以斷定他也在場。師哲記憶與此不合。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辦公室記錄的這次會議進出人員中卻沒有師哲。這說明師哲所說的‘柯瓦廖夫根本就沒有參加劉少奇和斯大林的會談’的記憶是不準確的。”¹²

從 1949 年建國，我國領導人出訪從來自帶翻譯，這是一條沿用至今的老規矩。劉少奇 1949 年訪問蘇聯和斯大林會談帶了一名俄文翻譯，即師哲同志。師哲當年去蘇聯就是給這次會談當翻譯的，怎麼可能到了會談時他卻不在了？歷史事實也是如此，劉少奇 1949 年訪蘇時的所有會談都是由師哲翻譯的。至於 1949 年 6 月 27 日這一天在斯大林辦公室的來客登記上沒有師哲的名字，顯然是漏寫了。《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的執行總主編沈志華在該書 20 卷（該卷刊登了斯大林克里姆林宮辦公室來客登記簿——本文作者註）最前面反復說明，“記錄顯然還存在許多錯漏的地方。這些都是研究者在使用這些檔案文獻時需要留意的”。¹³ 張文木

¹² 張文木：〈“高崗問題”的若干考證及其他〉，《香港傳真》No.2010~8。

¹³ 沈志華：《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 20 卷，社科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第 3 頁。

顯然沒有留意到這句話。

在蘇聯退休外交官、歷史學家列多夫斯基的著作《斯大林與中國》中有一份 1949 年 6 月 27 日斯大林與中共代表團的會談紀要。這份紀要的一開始就是參加會談的名單，其中倒數第二名是卡爾斯基（師哲的俄文名字——本文作者註），而最後一名是柯瓦廖夫。¹⁴ 這兒的關於柯瓦廖夫參加會談的記錄顯然與事實不符。確切地說，柯瓦廖夫雖然 1949 年 6 月 27 日那天的確進過斯大林的辦公室，但是他並沒有參加中蘇領導人會談。據師哲回憶，“柯瓦廖夫根本就沒有參加劉少奇和斯大林的會談。劉少奇去蘇聯，柯瓦廖夫同行，他的工作是我們到大連，由他出面向蘇軍交涉，派飛機送劉少奇一行經朝鮮上空、遠東到莫斯科。在路上用了七、八天時間。劉少奇第一次拜見斯大林時將柯瓦廖夫帶到克里姆林宮。但是並沒有讓他進談判的房間，而是在外面等著。斯大林知道他也來了，派人把他叫進來，問他一路上的情況。他見了斯大林像個小學生一樣站得筆直，十分緊張、拘謹。回答完了問題，斯大林示意讓他出去，他就趕快退出會場。所以他並不知道談判的經過”。¹⁵ 可就是這個柯瓦廖夫後來卻到處吹噓他參加了蘇中領導人會談，並且無中生有地杜撰了許多會談時蘇中雙方領導人的談話內容，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中蘇兩國人信以為真。不過凡是理性思維的人都明白，進過斯大林的辦公室和參加了中蘇領導人會談完全是兩碼事，這是起碼的常識。柯瓦廖夫這個小小的中長鐵路的蘇方代表，怎麼可能參加只有中蘇兩黨兩國領導人才能參加的最高級會談呢？真是天大的笑話！總而言之，師哲作

¹⁴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 2001 年，第 97 頁。

¹⁵ 李海文：〈毛澤東劉少奇訪蘇及中蘇兩黨關係中的一些問題〉，《人物》1993 年第 2 期，第 91 頁。

為翻譯參加了 1949 年劉少奇和斯大林的全部會談，包括 1949 年 6 月 27 日的會談（如果有疑意，可以到中央檔案館查證 — 本文作者註）。而柯瓦廖夫這個中長鐵路的蘇方代表沒有也不可能參加 1949 年中蘇領導人會談。他僅僅是在 6 月 27 日會談時被斯大林叫進去問了幾個問題，隨後馬上退了出來，始終呆在會談房間的外面。

綜上所述，我對張文木對師哲的質疑感到費解。附帶說一句，張文木在他的文章〈“高崗問題”的若干考證及其他〉裡面，幾次引用某人寫的關於高崗的文學作品裡的文學想像描寫來為自己的政論文章作證，對此，我同樣感到費解。

除此之外，柯瓦廖夫還繪聲繪色地編造了所謂高崗說那些話時的周邊情景，斯大林如何反映，劉少奇如何反映，（從未發生此事，除了杜撰者柯瓦廖夫本人，沒有第二個人證明有此事 — 本文作者註）；他還說高崗用俄文（高崗半句俄語不會說，柯瓦廖夫半句中文不會說 — 本文作者註）和他談話，主動提出向他提供中共高層領導內部的情況；他還說 1949 年 9 月一個香港代表團訪問東北，只見斯大林的像不見毛澤東的像；毛澤東聽說後很生氣，開政治局會議批判高崗，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說了什麼，政治局對此做了什麼決議（從未發生此事，當時東北街頭掛滿毛澤東的像而無一張斯大林的像，毛澤東從未為此生氣，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未開過柯瓦廖夫所說的會議，劉少奇周恩來從未說過柯瓦廖夫編的那些話，當然更沒有通過柯瓦廖夫所說的決議 — 本文作者註）；他還說清晨四點鐘高崗一人去找他（高崗當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東北局第一書記兼東北軍區司令員、第一政委，身邊時刻被一大堆秘書參謀警衛員包圍著，怎麼會發生清晨四點他孤身一人去找一個鐵路上的外國技術員這種奇聞怪事，這個謊言杜撰得太滑稽了，可以收入《笑話大全》 — 本文作者註）；

他還說 1949 年 12 月毛澤東訪蘇經過瀋陽時，高崗和林彪準備了一車皮禮物送給斯大林，被毛澤東拒絕了（從無此事，高崗和林彪從未給斯大林送過一件禮物，更不用說一車皮了——本文作者註）；他還說，他和米高揚聊天（米高揚與柯瓦廖夫的地位之間有如天壤之別，怎麼會聊天呢？見也見不上呀！柯瓦廖夫最好重新寫一部創世記，講他怎樣創造了宇宙和世間萬物——本文作者註）。總之，柯瓦廖夫對岡察洛夫的談話從頭至尾全是憑空杜撰的謊言，沒有一句實話。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億五千萬（當年）人口中，在前蘇聯一億八千萬（當年）人口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聽到或看到柯瓦廖夫所說的那些事情；在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9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前蘇聯 220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任何一份文件或記錄記載了柯瓦廖夫所說的那些事情。現在讓人不可思議的並不是臭名昭著的騙子柯瓦廖夫造了什麼謠，而是有人對這些連中學生都騙不了的蹩腳謊言奉若神明，是出於無知還是別有目的？

柯瓦廖夫不光給高崗、林彪造謠，他也誣陷劉少奇。他說，劉少奇在 1949 年 7 月 27 日的聯共（布）政治局會議上收回了請蘇聯空軍和潛艇幫助解放臺灣的問題。¹⁶ 對此師哲反駁道：“根本沒有這種事”。¹⁷

高崗幾次去蘇聯都是黨中央派遣的，每一次都是由毛澤東的翻譯師哲擔任翻譯的。20 世紀 90 年代李力群曾去木樨地 22 號樓拜訪師哲，問他，“很多報紙和雜誌都刊文說，高崗在同斯大林會談時談到把我國東北歸屬蘇聯，作為第 17 個加盟共和國，有這

¹⁶ 張聿溫：《死亡聯盟——高饒事件始末》第 386 頁。

¹⁷ 李海文：〈毛澤東劉少奇訪蘇及中蘇兩黨關係中的一些問題〉，《人物》1993 年第 2 期，第 92 頁。

事嗎？”師哲哈哈大笑，連連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後來師哲曾在多種場合以口頭和書面不同形式反駁此謠言。例如師哲在同李海文的談話中，例如師哲在幾本書中均對此謠言反駁：“據我所知，此說無根據”。¹⁸高崗每次去蘇聯除了翻譯師哲之外，還有別的同志同行。但是所有這些人同樣沒有人聽見過高崗向斯大林談論把我國東北歸屬蘇聯，作為第17個加盟共和國。當柯瓦廖夫製造的這個謊言在20世紀90年代傳入我國之後，有關方面曾進行調查。當時還健在的參加過1949年劉少奇、高崗和斯大林會談的我中方同志都拍桌子大怒，斷然否認有此事。

其實，根本不用調查，任何非智障人士都明白，如果高崗在1949年真做了那事，那麼他在回國剛下飛機就會被關起來，而不會以後還步步高昇；其實，完全不必憤怒，任何神志清醒人士都清楚，如果高崗在1949年真做了那事，那麼在1954年打倒他、掘地三尺搜集他的罪行時一定會對此大書特書、全黨批判全國聲討，而不會在當年批判高崗的所有文件裡隻字未提此事。

高崗的最後一任秘書趙家梁對於扣給高崗的“裡通外國”的帽子如是說：

其實，“高崗裡通外國”的罪名至今廣為流傳，其由來是有人在中央高幹座談會上（1954年——本文作者註）揭發說，在東北時期，高崗“與一個洋人單獨談了三天三夜”，引起與會者嘩然。後來國內外的一些書刊都曾談到高崗向蘇聯或斯大林送情報，反映中國共產黨內的矛盾和反蘇情況。

事實並非如此。所謂“與洋人單獨談了三天三夜”純屬捕風捉影。

¹⁸ 師哲：《毛澤東的翻譯——師哲眼中的高層人物》第102頁；《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9頁。

那是在 1947 年或 1948 年之交，蘇聯的一個名叫卡瓦列夫的軍事情報員來東北民主聯軍司令部找劉亞樓索取“關於東北敵我軍事力量對比和增加的估計”等材料。當時劉亞樓是東北民主聯軍的參謀長，卡瓦列夫與劉亞樓有過工作上的聯繫。可是劉亞樓不在，便要找當時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員高崗。高崗讓秘書劉家棟將其介紹給作戰參謀處處長尹達。在整個過程中，高崗根本沒有和卡瓦列夫見面，哪來“談了三天三夜”？更何況他不懂俄語，又怎能單獨密談呢？

關於給蘇聯送情報的問題，更是無稽之談。

1945~1946 年間，北滿解放不久，蘇聯內務部在我東北各地建立了二三十個情報組織，其中極大部分成員是地主或傾向於國民黨的人員（前面提到的李先生 LYR 和他的父親就屬於該情報組織——本文作者註）。這些情報組織給蘇方提供了不少對中共不利的失實情報，其中就有一些是說，東北的大多數中央委員是“反蘇的”，是對蘇聯“不友好的”這類完全失實的情報。蘇聯內務部和情報部門都曾收到過這些電報。當時中共的東北領導人，包括高崗在內，就曾正式向蘇聯指出過這種不當的情況。1946~1947 年間，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說，李富春在齊齊哈爾有反蘇言行。林彪、高崗、陳雲三人當即責問這是從哪裡來的謠言？並申明李富春是我們東北的重要領導幹部，他與中央完全一致，對蘇聯十分友好，根本不會反蘇，絕沒有反蘇言行。

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由於個別蘇聯軍人強姦婦女和蘇軍撤退時將大量東北的工業設備拆運回國，的確曾引起一些群眾和幹部的不滿甚至憤怒，這無可非議。蘇聯情報人員把群眾的這種不滿情緒歪曲誇大為“反蘇情緒”，並嫁禍於東北局的一些負責人，是完全錯誤，甚至是別有用心的。東北局的領導同志一方面向蘇方嚴正交涉，使他們處決了犯罪分子，以平民憤；同時批評蘇聯的情報不實；另一方面教育幹部群眾從大局出發，看到蘇聯出兵

東北的偉大歷史作用，維護中蘇友好關係；也嚴肅批評了個別幹部的不當言行。今天看來，東北局的處置仍是正確恰當的。

……還說到另一個叫張某的“神秘人物”（影子）是高崗與蘇聯駐瀋陽總領事之間的聯繫人，據我所知也純屬子虛烏有。因為以高崗當時的身份，無論多麼“神秘”的人物，要接近高崗，都瞞不過警衛和隨身工作人員。¹⁹

以上就是所謂高崗裡通外國事件的來龍去脈。最主要的兩條謠言均出自原中長鐵路的蘇方代表柯瓦廖夫之口。對此，我有關方面多次調查的結果都是查無實據。而在前蘇聯方面，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證實了柯瓦廖夫所說的事情，同樣沒有任何一個人聽見或看見了柯瓦廖夫所說的事情。親歷此事的我國著名翻譯家師哲同志曾多次公開著書出文、數次接受訪談，指出柯瓦廖夫在無中生有地杜撰。可是國內有的人卻執意堅信騙子柯瓦廖夫的痴人說夢，以訛傳訛，到處炒作，甚至想方設法要推倒事件的見證人師哲的證詞，這到底是為什麼？

¹⁹ 趙家梁：〈對“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一文的幾點意見〉，《百年潮》2002年第3期。